

我国中小学学校改进研究述评与展望

——基于2005—2021年CNKI文献的知识图谱分析

徐长虹，徐玲

[摘要] 运用Citespace软件，对CNKI数据库中的2005—2021年我国中小学学校改进文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学校改进研究发展速度较快，研究主体单一，研究机构之间合作度较低，研究方法以质性研究为主，研究内容聚焦于概念界定、理论探索、路径选择、主体参与四个方面。展望未来，学校改进研究需要扩大研究主体的广泛性和参与度，注重研究方法的多元与融合创新，加强研究内容的关联性综合研究。

[关键词] 学校改进；改进路径；知识图谱

自20世纪60年代起，学校改革运动在美国掀起热潮，迈入80年代，这股热潮迅速地席卷全球。受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思潮的影响，学校改进和永续发展成为当今改善学校教育质量的核心课题(杨子秋，2007)。虽然学校改革运动开始较早，但将“学校改进”作为专有术语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而我国在真正意义上对此有所跟进，不过十几年的时间(李保强和刘永福，2010)。当下处在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期，学校改进的内涵意蕴、发展状态和路径选择必然面临着新的解读、挑战和机遇。为此，系统地梳理我国中小学学校改进已有成果，对于基础教育未来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一、学校改进的研究概况

本文以主题词^①“学校改进”并含“中小学”“基础教育”为检索内容，以CNKI文献数据库为检索范围，筛除与研究主题关联性薄弱的论文，获得论

[收稿日期] 2021-07-28

[作者简介] 徐长虹，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电子邮箱地址：xchmay@163.com；

徐玲，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电子邮箱地址：Cnuxuling555@163.com。

^① 主题词检索是指同时在题名、关键词、摘要三个字段中检索，可检索出这三项中任一项或多项满足指定检索条件的文献。

文数量共计 368 篇，作为本研究的数据样本，其中硕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60 篇，期刊论文 308 篇。最后一次文献收集日期为 2021 年 6 月 30 日。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法和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法，研究工具为 Citespace5.5.R2 软件。

(一) 文献发表时间分布

据知网可查，以学校改进为主题的最早论文由梁歆、汤才伟于 2005 年发表。2005 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颁布，意见提出充分发挥优质公办学校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薄弱学校改进。在政策推动下，学校改进研究在我国逐渐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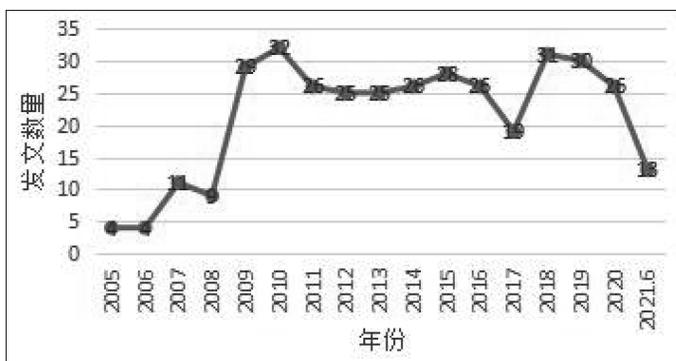


图 1 论文刊载时间分布图

由图 1 可知，论文数量第一个增长点在于 2007 年，由于 2006 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终止了中小学重点学校制度，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学校改进进入制度化推进阶段。第二个增长点在于 2009 年，源于 2008—2009 年教育部陆续颁布了一系列规范义务教育办学行为的意见。之后学术论文发文量陡增，学校改进研究进入繁荣期且热度延续至今。第三个增长点在于 2010 年，源于 2010 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了中小学改革任务。以 2017 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为标志，我国学校改进工作在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政策指引下进入一个新时期，由此 2018 年掀起了研究的新高潮。在国家教育均衡发展政策的推动下，学校改进成为近些年基础教育领域受到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

(二) 文献作者和机构分析

从图 2 可知，研究者之间联结比较分散，连线很少，较为显著的是以东北师范大学杨颖秀为中心形成了合作网络，包括陈卫红、胡淑波、李慧等人；联合发文量较高的是香港中文大学卢乃桂和张佳伟，共发表 5 篇；还有几位

成互动良好的合作网络。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教育研究所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北京教育学院之间有密切合作；北京师范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也存在合作关系；其他学校之间联系不紧密。研究地域分布方面，主要研究力量集中在北京、上海等东部高校和东北地区高校，东南地区次之，中西部研究力量亟需加强。

(三) 高频关键词分析

在关键词共现网络中(如图4所示)，节点(及标签)的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节点越大则代表关键词词频越高。我国学校改进研究的高频关键词排名前十位的依次是学校改进(184次)、薄弱学校(24次)、学校文化(13次)、学校效能(11次)、学校特色(9次)、学校管理(9次)、伙伴协作(9次)、特色学校(9次)、校长(8次)、学校特色发展(8次)。不难看出，我国学校改进研究的热点集中在薄弱学校的改进路径上，包括伙伴协作、学校文化建设、学校特色发展等。



图4 学校改进研究关键词共现图

在关键词共现图的基础上做聚类分析，可以大致了解学者在进行学校改进研究过程中关注点的变化。图5中#0、#1……等代表聚类序号，序号越小则聚类的规模越大。Citespace 根据网络结构和聚类的清晰度提供了两个评价指标，本文的聚类视图评价指标显示：聚类模块值 $Q=0.8159$ ($Q>0.3$ 意味着划分出来的社团结构是显著的)，聚类平均轮廓值 $S=0.9637$ ($S>0.7$ 意

味着聚类的高效率是令人信服的), 表明视图的聚类效果优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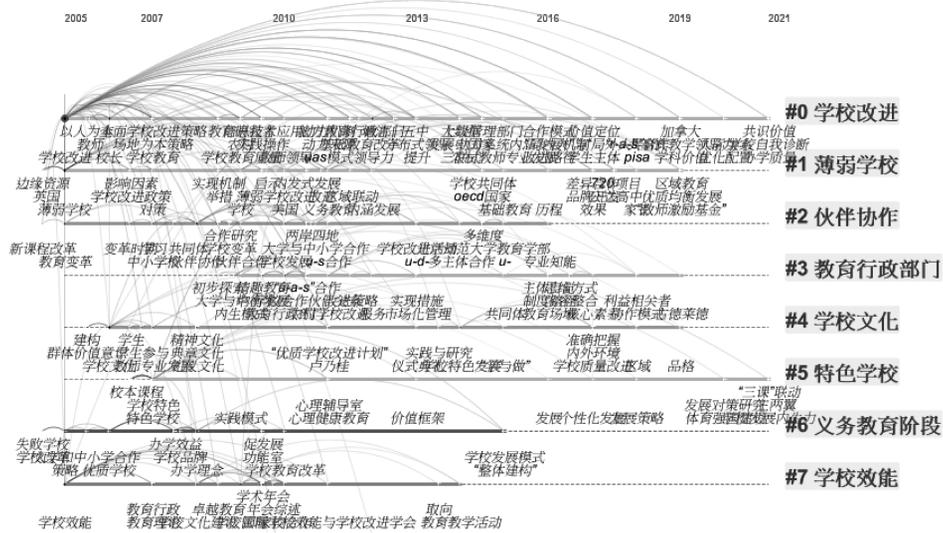


图5 学校改进研究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

从图5可看出, 学校改进研究的高频关键词被聚成8类。聚类#0“学校改进”出现在2005年, 随后几乎传承至每个节点。由此可知, 学校改进从2005年起备受关注, 这和文献数量变化一致。聚类#1“薄弱学校”涉及的关键词有边缘资源、内涵发展、影响因素、举措、对策等, 被学者持续关注到2019年。聚类#2“伙伴协作”持续至2016年, 一直受到学者关注, 其中, “大学与中小学合作”“多主体合作”“学习共同体”等研究方向受到了学者的青睐。聚类#3“教育行政部门”是学者近几年关注的热点, 包括“协作模式”“实现措施”等关键词。聚类#4“学校文化”包含“精神文化”“群体价值”等关键词, 聚类#3和聚类#4均持续至2019年, 一直受到学者关注。聚类#5“特色学校”自2007年起, 始终受到学者关注, 其中, “学校特色”“校本课程”“个性化发展”等是备受关注的热点关键词。聚类#6“义务教育阶段”和#7“学校效能”被学者持续关注到2013年。2015年之前, 学者更关注学校效能和学校改进的关系问题、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改进问题以及学校改进的伙伴协作路径。2015年之后, 文化建设路径研究和特色学校发展研究不断涌现, 另外, 薄弱学校改进研究几乎贯穿始终。

(四) 文献研究方法分析

研究方法主要可分为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两类, 质性研究包括历史研究法、内容分析法(又称文本分析法)、个案研究法、叙事研究法等; 量化研究

包括文献计量法、调查法、实验法等。学校改进已有文献采用质的研究方法居多,文献分析法占78%,个案研究法占15%,量化研究方法则较少,占7%(见表1)。这是因为学校改进的研究范式主要采用思辨性研究以进行现象的分析、理念的推广以及观点的争辩。

表1 学校改进研究方法分类表

研究方法	质性研究方法		量化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法	个案研究法	文献计量法	调查法	实验法
文献数量	288	54	2	23	1
占样本总体的比例	78%	15%	0.5%	6.2%	0.3%

二、学校改进的研究主题

本研究对国内“学校改进”已有文献做分析、整理和提炼,发现学校改进研究聚焦于以下四个主题:概念界定、理论探索、路径选择、主体参与。

(一)学校改进的概念界定

不同学者对学校改进的概念界定各不相同。有些学者从较为宏观、概括化的角度给学校改进下定义,如沈玉顺(2007)提出学校改进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通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变革,使学校向着理想方向发展。楚旋(2009)认为,学校改进是为提高学校变革能力和改善学校学习条件,所进行的系统的、持续的变革努力。

有些学者从微观、具体化的角度,挖掘学校改进的必要条件。陈丽(2010)指出,学校改进即针对学校发展中的问题,有计划地变革学校内外部运行要素、方式与理念,从而推动学校向理想目标发展。梁歆(2007)提出学校改进的必要基础是教学变革,以及为教学改革提供支持性条件。邬志辉(2008)认为学校改进的必要条件有三:学校成员价值观的持续改进、学校主体能力的全面提升、学校全面绩效的综合提高。

虽然界定角度不同,但以上学者无一例外均将学校改进看作动静态的结合体,即不仅表现为结果上的改进,还表现为不断发展、不断追求卓越的过程。目前学界较多引用1985年经合组织资助的“国际学校改进项目”中的界定:学校改进是改变一所或多所学校的学习条件或者内部条件时所进行的系统、持续、有计划的努力,最终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实现教育目标(范维尔森等,1985)。该定义强调学校内外部条件的改变,突出详细计划、系统管理、

持续努力的重要作用；最终目标是实现学生全面发展和教师专业发展，意味着学校改进不仅要变革学校组织结构，更应关注教学实践和学生成长，这是学校改进的核心。

(二) 学校改进的理论探索

从不同的学科来审视学校改进会使其理论基础得以丰富，得以新的拓展与延伸。目前，学校改进已有研究主要基于社会学和管理学两个学科视角展开论述，在理论基础和核心观点上各具特色。

1. 社会学视角

学校作为一种客观性社会存在，需要运用社会学理论对其加以分析。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受到微观、中观、宏观和外观四套依次层叠的系统的影 响，何二林(2020)基于该理论提出学校改进的成功是多个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宏观层面政策的出台保障学校改进的人力和物质基础，中观层面地方管理体制的改革为学校改进提供自主权，微观层面帮扶机制的建立为学校改进提供动力，外观层面社会的支持是学校改进的重要条件。

混沌理论改变以往将有序和无序二元分离的传统，将二者视为动态变化的互动关系；并且认为秩序运行的方式并非是简单、固定的，反而具有随意性。孟范英等人基于该视角提出，学校改进要打破机械封闭，开放接纳新要素，产生“无序”，从而保持活力；同时，学校变革复杂难测，秩序的随意性要求我们遵循学校发展的阶段特征和教育规律，要在秩序和无序之间寻求平衡，持续推进变革进程。

生命教育是以师生生命的真实存在为基础，通过对生活世界的关注，遵循生命的特殊性和发展的规律，以成全每一个生命、提升生命价值和质量为目的。徐月新(2003)从生命教育视角认为学校改进的重要环节在于搞好学校管理，倡导对学校管理的核心——教师多一些人性化、关怀式管理，少一点数字化、制度式管理。李越强(2007)提出学校应是适宜生命生长的教育乐园，通过树立客观务实的办学理念，建立以人为本的制度文化、营造和谐融洽的人文环境来改进学校。

2. 管理学视角

学校是个复杂而又充满创造活力的组织，基于学校组织的特性，学校改进必然被纳入到管理学领域。

基于战略管理视角，有学者认为学校战略管理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共同分析学校内外部环境，制定学校发展目标，拟定并优选战略方案，组织施行

和调整把控的动态过程(刘艳萍, 2020)。以此来看,有效的学校改进路径是通过战略管理唤醒学校的自我发展意愿,培育自我改进能力。另外,学校发展规划作为一种战略管理新模式,也可以推动学校改进,即围绕学校发展的核心价值和远景,制定学校发展整体方案,并不断实施、评价、改进方案,从而推动学校可持续发展(郭良君, 2011)。

基于系统论视角,学校改进被认为是一个系统复杂的过程。楚旋(2011)提出“四主体—四维度—三重认识论”的综合学校改进研究框架,基于技术认知兴趣、实践认知兴趣、解放认知兴趣三重认识论,对学校、政府、变革代理人和社区四个主体,从理念、结构、行为、关系四个维度进行研究。郑立群(2019)提出学校组织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其运转的影响因素包括投入和转化过程、产出、反馈及环境,并将学校薄弱原因归结为人财物投入弱;管理缺位、执行不力导致转化过程弱;以“师生均不能有效发挥组织成员的凝聚力”为表现的产出弱;组织文化和社会影响力弱。

基于制度理论视角,张菲菲(2008)从新制度主义者斯科特(W. R. Scott)提出的法令规章、行为规范和文化—认知三要素来分析,指出学校改进存在着“政府职责履行不当,学校价值取向不清,社会参与度低”问题。周兴国(2010)从制度分析理论的视角发现竞争机制与行政主导是公立薄弱学校形成的主要原因。林海岸(2019)以机制设计理论为视角,从资源分配、信息效率、激励相容三方面提出学校改进建议。

(三)学校改进的路径选择

学校改进工作的开展需要对众多问题进行考量,例如学校现实状况、可能发展条件、主要改进阻力等。因此,选择何种改进路径,通常是变革实践者最关心的问题。

1. 文化建设

学校文化决定着学校的凝聚力、创造力和竞争力,学校改进可以培育先进的学校文化为突破口,借以增强“造血”能力。

在学校文化的具体指向方面,张俊华(2008)认为环境文化、典章文化、精神文化、礼仪文化是影响学校改进的四种文化。班建武(2011)诊断学校文化后,发现管理导向的文化在学校盛行,缺少情感导向和创新导向的文化氛围。魏会超(2013)从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以及物质文化等层面,通过个案研究验证了学校文化建设对学校效能提升的促进作用。

在学校文化的建设策略方面,从形成机制上看,薄弱学校的形成机制是

场域塑造惯习，惯习变通制度，制度孕育文化，可以通过文化植入、文化整合以及文化自觉的路径推动薄弱学校的文化改进(周常稳和周霖，2019)。从价值意识建构的角度看，建立群体共享的价值参照系统是建构学校文化的有效途径(李红霞，2006)。但只有在准确理解学校文化内涵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学校及所在区域历史文化背景，做好顶层设计；澄清主体，拓宽师生参与渠道，才能建立起适宜的学校文化。

2. 伙伴协作

大学与地方院校(U-U)、大学与中小学(U-S)、中小学校之间(S-S)的合作是我国学校变革区域推进中合作的三种初始类型。U-S协作是伙伴协作的主要模式，双方协作的重要基础是大学与中小学之间的资源差异。目前的U-S合作实践类型包括单向传递报告型、项目研究合作型、咨询合作型、实验推广型、教育实习型等(彭虹斌，2012)。无论哪一种类型都缺乏针对性，较少考虑学校自身的历史传统、文化风格和发展特性；并且面临着制度、物质和资金保障上的困难；大都是短期的合作行为，缺乏持续性。解决以上问题的途径有：尊重学校的独特性，进行校情分析，整体设计学校改进方案；引入外部保障机制，主动寻求教育行政部门和社会基金组织的支持(汪明春，2019)。吴康宁(2010)认为要想使大学与中小学的合作得以深度的、可持续的推进，双方在合作中的文化融合乃为必由之路。

在“U-A-S”合作中，地方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的角色定位通常是项目运行的保障者、总体发展目标的引领者、U-S关系的协调者，而大学和中小学的角色形态是合作者和建构者(吕立杰，2012)。在实践中，“U-A-S”模式初见成效。无论是北京的薄弱学校改进计划，还是东北的优质学校创生计划等，其背后都离不开强大的地方政府支持和协调。但“U-A-S”合作也会产生问题：一是合作关系所固有的冲突，如价值冲突、标准冲突；二是在合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具体问题，如经费筹措、教师抗拒(芦焱，2011)。建议加强沟通、增强合作者的成本意识；明确合作主体的理想角色，各司其位；加强激励、评价等相关机制的建设。

随着实践发展，又出现了“A-R-S”，即教育行政部门、科研机构、学校三方合作模式。例如2018年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受房山区教委委托，承接了南沟乡村教育联盟建设项目(陈惠英，2021)。在这一合作模式中，教育行政部门是主导，学校是主体，科研机构是支撑，三方优势互补，从薄弱学校实际需求出发，对其进行问题诊断、制定改进规划、执行方案及评估改进效

果,共同探索合作的机制。

3. 特色发展

学校特色发展是学校改进的一种基本策略,学校在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基础上,对所在区域、学校内部资源进行深入挖掘或重组利用,从而形成特定领域独特风格或自身优势(范涌峰和宋乃庆,2017)。

对于学校特色发展的价值意义,学校特色发展既是促进学校质量改进的支点,是深化课程改革和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路径,是推进教育内涵式均衡发展的新方向(范涌峰和宋乃庆,2018);又能通过特色学校建设实现优质发展,因为在内在逻辑层面,特色是学校发展的价值增加;在动力机制层面,特色能够引发学校系统优化(熊德雅等,2013)。

对于学校特色发展的逻辑框架,学校特色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学校质量改进,价值前提为学校文化的创建和沉淀,核心支撑是特色课程体系的建立,基本保障为学校组织的系统化管理(范涌峰和宋乃庆,2018)。

对于学校特色发展的构建途径,一种是凸显学校办学特色,主要针对特定类型的学校,如外国语学校、体育学校(武术特色、足球特色等)、民族艺术学校。对这类学校而言,巩固完善民主高效的管理体制,整合已有课程类型,强化特色课程,建立鲜明、丰富的学校文化是强化特色发展的途径。另一种是凸显学校课程特色或活动特色,普通学校依托其悠久的办学历史、特殊的地理位置、优越的人文资源或研究性学习、学生核心素养以创建特色校本课程、特色活动和项目。课程是学校改进的载体,建设特色课程是学校特色发展的重要抓手(何永红,2011)。重庆市巫山中学以三峡红叶为文化载体,开发出“三峡红叶诗文赏析”“本土地理地质研究”等校本课程。浙江省瑞安市红旗实验小学抓住“寓言大市”的有利条件开发寓言文学创作类课程。学生核心素养被视为课程设计的DNA(范涌峰,2018),重庆市兴龙湖小学确定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标准:身心健康、家国情怀、审美雅趣和持续改变。北京市昌平区C中学通过构建研究性教学模式、建设研究性教师队伍、开发研究性校本课程,促成学校“研究性学习”特色的形成。坚持特色活动和项目,是创建学校特色的“发动机”(林卉和苏艳芳,2007)。南京市“阳光体育学校”形成跆拳道特色项目,山东德州涌现一批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山东临沂推出“国学经典进校园”“经典诗文进课堂”等特色活动。

对于学校特色发展的一般流程,主要有三种实践性经验,一是从特色项目入手,“项目突进,全面优化”,基本路线为“特色项目—学校特色—特色学

校”(李淑春和邓成林, 2011); 二是从顶层设计着力, 基本路线为“特色定位—顶层设计—全面施工”(李淑春和邓成林, 2011); 三是从模仿到创新, 基本路线是以“点”切入—“立体”架构—“迁移”生成—长期“坚守”(许建国, 2010)。学校特色的打造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一般要经过从孕育特质、生成特点到拥有成熟特色三个阶段(李仁华, 2012)。

(四) 学校改进中的主体参与

1. 校长领导

校长在引领学校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校长是兼容行政信息、学术信息、社会信息的决策中枢, 是学校改进的领导者 and 责任人(胡小萍和叶存洪, 2013)。校长管理和领导的能力不仅体现了个人的专业素养, 更关乎学校整体教育质量的提升, 所以校长领导力提升是当前学校改进的诉求。浇筑理念、创建愿景、凝练信任、分享权力是学校改进取得成功的重要领导力(杨颖秀, 2012)。尤其是理念, 当校长将正确的理念与实际行动融为一体的时候, 就会在教育实践中产生领导力的升华, 为学生创造更多的成长机会, 也才能体现校长领导力的生命意义。校长领导力聚焦在确立发展愿景、强化制度建设、优化课程建设与教学管理、教师发展等四个方面发挥作用, 有效推动学校的脱困和扭转(杨伟悦, 2018)。也有学者提出“基于校长领导力所推行的实施专业的教学领导、树立共同愿景及明确责任分担等是改进学校的可行策略”(鞠永生, 2014)。但成功的学校领导实践总是对特定的学校发展要求的一种感性回应。校长应根据自己学校独特的背景条件与问题, 选择恰当有效的变革方案与领导路径。

2. 教师发展

教师是学校改进中关键的能动者, 是影响学生成长、学校发展的重要角色。已有研究集中在教师领导力和教师专业发展两方面。

对行使领导力的教师——“领袖教师”的研究, 围绕其在学校改进中的角色、能力、作用而展开。领袖教师的角色包括经纪人角色、指导者角色、调节者角色和成员角色(张佳伟和卢乃桂, 2010)。汤采伟(2010)根据学校改进的不同阶段划分了领袖教师工作和能力: 筹备阶段包括对校内教学问题的警觉和承担、提出解决方法和成立工作小组; 执行阶段有调控工作的点面和进度、建立双向的沟通机制等; 总结阶段是总结经验、建立分享文化、培养新的领导人才。在学校改进中, 教师领导者的重要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 通过有效的班级管理, 改善学生的学习成效; 激励教师改进教学, 建立学习共同

体,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参与学校事务,推动学校变革(蒲蕊,2012)。

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学术研究,集中在构建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探讨教师专业发展机制上,并出现批判理智取向的系统培训发展模式,强调实践反思取向的教师自我发展的趋势(王海英,2015)。在实践中,中国教育学会近年来通过建立教师发展学校,积极介入在职教师的培训工作;香港也通过实施“优质学校改进计划”等措施提升教师水平,从而带动学校改进的深入发展。

3. 学生参与

学生的进步发展是学校改进的核心和最终目的。已有研究主要围绕学生参与的方式和角色展开。参与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赋予学生权力和权威、在学校改进的不同阶段配合不同程度的学生参与、加强学生和成人间的对话(卢乃桂和张佳伟,2007)。学生参与学校改进的水平不同,所对应的角色也不同。当学生作为数据来源时,学生的角色是接受者;当学生积极反应时,学生的角色是讨论者;最高层次是学生成为教师的合作伙伴,角色是共同研究者(孙素英,2013)。学校改进要支持学生发出自己的声音,使学生处于持续的学校改进的中心。

4. 教育研究者协作

在理论研究中,学者们认为在学校改进过程中,教育研究者与学校之间是一种专业共生的伙伴协作关系。叶澜(2009)认为研究者采用“主动深度合作式研究”可以与教师产生互动创生的新型关系。研究者需要转变身份,从中立者变成介入者,由权威者转变为倾听者,从评判者变为合作伙伴。研究者发挥着“提供教育变革所必需的新理论参照系与思维方式、推进研究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转换与交互生成”的作用(叶澜,2009)。

而在现实中,教育学者通常以行政任命或课题指导的方式介入学校改进,常遭遇如下困境:话语体系差异带来的沟通困难;刚性介入方式导致的动机缺失;改进效果不明显产生的信赖危机;专家参与终止引发的发展断裂(程灵,2009)。造成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两张皮”,即教育学者自言自语、一线教师我行我素的局面(刘长海,2009)。针对此类问题的有效解决办法是教育学者要走出“专家”“指导”等桂冠所带来的心理幻象,转变角色,诚挚沟通,达成共识;学者与教师要形成伙伴协作关系,要有明确的研究主题和目标、有良好的情感认同、结成发展共同体(刘长海,2009);学者要关注教师课题研究能力、问题诊断能力、行动研究能力的提升(程灵,2009);二者的合作要以制度建设为支撑,提高协作的可持续性。

5. 家庭参与

学校改进离不开家庭的参与和支持。家庭参与学校改进的内容，其一是依靠家长的校外资源优势 and 职业、专业特色，参与学校教育工作；其二是通过对事关学生切身利益的学校计划和决策提出意见建议，参与学校管理工作。但家长在参与学校管理方面存在着意识薄弱、角色定位不准确、参与内容片面，参与过程有诸多障碍，力不从心的问题(张茜，2018)。在实践中，陈惠英(2018)通过对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发展现状的调查，从家长视角提出学校发展的建议：进一步增强学校课程的丰富性，增加活动类课程；教师多关注孩子的进步和身心健康成长等。

三、学校改进研究的评述与展望

(一) 扩大研究主体的广泛性和参与度

前文已述，我国学校改进研究者的数量较少，主要集中在师范院校和科研机构，缺乏学校管理者和一线教师的参与，研究主体的广泛性较弱，并且研究机构之间尚未形成互动良好的合作网络。学校改进内容庞杂，牵涉主体众多，因此要加强合作，可以联合相关科研机构 and 高等院校，发挥智囊团的优势，攻克学校改进过程中的难题。并且要扩大地域性研究视角，联动不同区域、不同省份以及不同层次类型高校，共同开展学校改进研究，促成经验分享、资源共享的研究共同体建设。一线学校改进的参与者，即校长和教师对于其中的问题具有体验性的认识，给予他们充分的观点表达权和适当的决策权，有利于学校改进的纵深推动。可见，通过扩大研究主体的多元化、广泛性和参与度，能推动学校改进研究领域的全方位发展。

(二) 注重研究方法的融合与创新研究

国内关于学校改进的研究多以质性研究为主，量化研究和混合研究较少。多数研究采用思辨性研究，而且大量个案性的经验探讨带有强烈的地域属性和本校特点，但我国地区发展、学校发展差异显著，所得的研究结论普适性不强。未来的学校改进研究方法应注重多样性的结合，加强混合研究方法的应用，在观察体验中引入定量分析，既可运用质的研究方法探讨现实意义、探究个案的深层次原因及做出独特性回应、总结特别经验以及问题策略，又可以从定量研究中发现实施效果和 经验差异，用数理分析进行因果推论；还可以结合使用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让学校改进研究方法呈现

出多样化和融合化的趋势。

(三)加强研究内容的关联性综合研究

学校改进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概念界定、理论探索、路径选择和主体参与。学术性研究的针对性越强、研究主题的限定词越多,就会导致单一性研究越多,综合性成果越少。因此,要进一步树立学校改进的全局观,联动各个单项研究,实现内容上的关联性综合研究。

理论研究是学校改进的基石。既有研究运用社会学理论分析现实中学校改进的成功经验和现存问题,缺乏运用功能论、互动论、冲突论等社会学基本理论来深入审视学校改进;学者们用管理学理论分析薄弱学校的形成原因及应对策略,都内含着宏观(政府和社会)和微观(学校)两个层面管理行动的统一,缺乏从更微观的师生、生生间的人际关系入手来研究学校改进,因为从学校改进的定义可知,教学实践和学生成长应是学校改进的关注核心。可见,目前国内关于学校改进的理论研究多集中在社会学和管理学领域,基于经济学、文化学等学科角度的研究较少,并且研究多基于单一学科视角,缺乏多学科综合视角的分析。所以在理论研究方面要扩大交叉学科的研究视角,利用多学科视角推动学校改进研究向纵深发展。

现有研究在学校改进路径上呈现出文化建设、伙伴协作和特色发展三种模式。不同路径的改进方式适用于不同的学校背景和学校的不同发展阶段。学校变革的理性路径应是自主变革,基于学校办学的实然状态,具体分析和积极利用学校内外资源,探究本校发展的深层次问题,着眼于师生的真实需求,进而选择适合本校的改进路径,施行一种渐进性和情境性的变革。相信随着相关理论和实践的深入发展,会涌现出更多的具有适切性的学校改进路径模式。

学校改进中的参与主体较多,但从范围上看缺乏对社区参与学校管理和改进的研究;从参与程度上看,教师、学生和家长的参与度仍然偏低,学校改进变成了学校管理层和教育学者的事,不仅是学校管理者,教师、学生、家长以及学校所在社区都是利益相关者,都有权参与到学校变革目标的确立中来,都有权选择适合自身学校发展的变革路径。综上所述,与参与主体相关的学校改进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还有待加强。

[参考文献]

杨子秋, 2007:《以校本课程领导促进学校改进之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李保强、刘永福, 2010:《学校改进的历史回溯及其多维发展走向》,《教育科学研究》第

2期。

沈玉顺, 2007:《教育变革时期的学校改进》,《教育发展研究》第20期。

楚旋, 2009:《学校改进基本问题探讨》,《教育发展研究》第24期。

陈丽, 2010:《学校改进的特征与价值取向分析》,《教育科学研究》第11期。

梁歆、黄显华, 2007:《从实施策略的视角简述美国学校改进的发展历程》,《全球教育展望》第8期。

邬志辉, 2008:《发展性评估与学校改进的路径选择》,《教育发展研究》,第18期。

何二林、潘坤坤, 2020:《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薄弱学校改进研究——以安徽省阜南县为例》,《河南科技学院学报》第2期。

孟范英、刘胡权, 2017:《基于混沌理论视角对当前学校改进的教育哲学思考》,《教育评论》第6期。

徐月新、沈正元, 2003:《从生命视角改进学校管理》,《江苏教育》第1期。

李越强, 2007:《从生命视角改进学校管理》,《教学与管理》第2期。

刘艳萍, 2020:《战略管理视角下的薄弱学校改进路径研究》,《中小学管理》第5期。

郭良君, 2011:《学校发展规划的改进——基于战略管理的视角》,《教学与管理》第31期。

楚旋, 2011:《系统论视角下的综合学校改进研究框架分析》,《教育发展研究》第31期。

郑立群、胡颖哲、曾庆伟、王爱丽, 2019:《基本系统论的薄弱学校改进策略》,《当代教育科学》第7期。

张菲菲, 2008:《学校改进的新制度主义学派视角分析》,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周兴国, 2010:《薄弱学校改进的困境与出路:制度分析理论的视角》,《教育发展研究》第4期。

林海岸, 2019:《全媒体时代学校德育机制的困境与改进——机制设计理论的视角》,《中小学德育》第4期。

张俊华, 2008:《影响学校改进提升与发展的四种文化》,《教育发展研究》第12期。

班建武, 2011:《学校文化现状诊断及改进路径》,《中国教育学刊》第2期。

魏会超, 2013:《以学校文化建设促进学校效能提升的个案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周常稳、周霖, 2019:《文化社会学视阈下薄弱学校的形成机制及改进路径》,《理论月刊》第8期。

李红霞, 2006:《学校文化与价值意识建构》,《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彭虹斌, 2012:《U-S合作的困境、原因与对策》,《教育科学研究》第2期。

汪明春, 2019:《基于学校改进的U-S合作及其实现》,《教学与管理》第18期。

吴康宁, 2010:《从利益联合到文化融合:走向大学与中小学的深度合作》,《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吕立杰、马云鹏、李晶, 2012:《制度驱动与文化构建:学校改进UAS项目中的三方角

- 色》，《现代教育管理》第8期。
- 芦焱，2011：《学校改进中的U—A—S合作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陈惠英，2021：《A—R—S合作模式下的学校改进初探》，《中小学校长》第3期。
- 范涌峰、宋乃庆，2017：《学校特色发展：内涵、价值及观测要点》，《教育研究与实验》第2期。
- 范涌峰、宋乃庆，2018：《学校特色发展测评模型构建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2期。
- 熊德雅、向帮华、王海洋，2013：《重建与优化：特色学校的价值框架与持续改进——以重庆市为例》，《教育理论与实践》第14期。
- 何永红，2011：《学校“特色课程”的定位及其发展策略》，《教育科学研究》第10期。
- 范涌峰，2018：《论基于核心素养的学校特色发展》，《教育科学研究》第1期。
- 林卉、苏艳芳，2007：《从学校内涵发展的视角看办学特色及形成策略》，《江西教育》第5期。
- 李淑春、邓成林，2011：《特色学校建设路径的实践探索》，《中国教育学刊》第9期。
- 许建国，2010：《特色学校建设的关注“点”》，《教书育人》第23期。
- 李仁华，2012：《以科学研究推动中小学特色学校的发展——中小学特色学校研究综述》，《中国民族教育》第3期。
- 胡小萍、叶存洪，2013：《谈基于校长领导力的学校改进策略——XJ中学改进的个案分析》，《教育探索》第5期。
- 杨颖秀，2012：《校长在学校改进中的领导力》，《教育理论与实践》第1期。
- 杨伟悦，2018：《扭转型领导与薄弱学校改进》，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鞠永生，2014：《基于薄弱学校改进的校长领导力研究》，鲁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张佳伟、卢乃桂，2010：《学校改进中教师领导研究述评》，《教育学报》第3期。
- 蒲蕊，2012：《教师在学校改进中的领导作用》，《教育科学研究》第5期。
- 王海英，2015：《学校改进视角下的农村教师专业发展》，《中小学教师培训》第11期。
- 卢乃桂、张佳伟，2007：《学校改进中的学生参与问题研究》，《教育发展研究》第8期。
- 孙素英，2013：《学校改进中的学生赋权——基于仪式典礼策划的个案分析》，《中国教育学刊》第2期。
- 叶澜，2009：《大学专业人员在协作开展学校研究中的作用》，《中国教育学刊》第9期。
- 程灵，2009：《教育学院学者有效参与学校改进的困境与突破》，《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第6期。
- 刘长海，2009：《伙伴协作：教育学者与中小学校的应然关系》，《教育科学研究》第3期。
- 张茜，2018：《小学生家长参与学校管理的现状及改进策略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陈惠英，2018：《家长视角：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发展的问题及改进建议》，《教育测

量与评价》第3期。

VanVelzen W., Milesm, Eckholmn, Hameyer A.U., 1985: "Making School Improvement Work", *Leuven, Belgium: ACCO*, 48.

**Review and Prospect of Improvement Research
in Chines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Knowledge Atlas Analysis Based on the CNKI
Literature from 2005—2021**

XU Chang-hong, XU Ling

(College of Education,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Citespace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improvement literature in China from 2005—2021 in the CNKI database. The study found that school improvement research developed rapidly, with a single research subject and a low degree of cooperation among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e research method is mainly on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 research content focuses on four aspects: concept definition,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path selection, and subject participation.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school improvement research needs to expand the universality and participation of research subjects, pay attention to the diversified and integrated innov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and strengthen the related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f research content.

Key words: school improvement; improvement path; knowledge map

(责任编辑: 杨娟 责任校对: 杨娟 胡咏梅)